

从中美关系“解冻”看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

——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分析

张威

(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关键词】 中美关系; 美国; 基辛格; 外交决策

【摘要】 基辛格是冷战时期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和战略谋划大师,亦是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机制中的核心成员之一。由他和尼克松总统搭档的“二人团队”垄断性地掌控美国外交战略,在世界舞台上掀起层层波澜,推动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的纵深发展。以中美关系“解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分析案例可见,伴随尼克松时代美国外交决策机制的调整,基辛格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美国外交权力谱系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卓著地位得以确立和不断强化,并通过个人色彩浓厚、目的明确的秘密外交重构国际格局。

【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3)04-0110-06

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世界风云际会,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查德·尼克松在1969年1月总统就职演说中不无感慨地说道:“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1]“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急剧而又极富戏剧性,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厘清这些变化;依据这些变化制定下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并找到合适的政策路径去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2]就任之后,尼克松旋即着手大幅度调整美国对外战略的总体布局,推行“尼克松主义”,在美苏关系、中美关系、阿以冲突、越南战争以及南亚局势等重大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上采取新的战略举措,并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外交决策机制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外交决策机制的调整是与基辛格在美国外交舞台上的纵横捭阖紧密相连的。学术界对基辛格研究的关注点多是关于他本人的外交思想以及在尼克松-福特时期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9-1975)和国务卿(1975-1977)期间的美国外交战略^[3]。本文依据新近解密的美国档案文件,以中美关系“解冻”作为分析案例,探究尼克松时代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与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地位和

作用有何内在关联,它对中美关系“解冻”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尼克松时代“垄断寡头型”外交决策机制的确立

“在美国的行政体系中,总统的个人风格、总统的关注和介入程度是决定决策结构最关键的因素。”^[4]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不久,尼克松就感觉到“在行政系统正常渠道内制定外交政策十分困难”,“白宫与国务院、国防部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关系紧张。”^[5]若要由自己掌控外交决策权,则必须使白宫和作为总统“近卫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中枢。在尼克松眼中,崇尚“秘密外交”的基辛格是一位出色的外交谋略大师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不二人选,而对于传统上掌握外交政策制定权的国务院,尼克松则极不信任,声称要对国务院进行改组,剔除“那些只会制定过时政策的一成不变的人”^[6]。在国务卿的人选问题上,由律师出身的并无多少外交经验的罗杰斯出任国务卿一职,亦是出于弱化国务院外交决策权的考虑。因此,尼克松个人的好恶、个性化的管理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收稿日期】2013-05-20

【作者简介】张威,男,湖北黄冈人,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历史学博士。

尼克松时代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内部的权力配置关系,并使得外交决策权逐渐由国务院向新晋的权力“豪门”——国家安全委员会转移,而尼克松—基辛格“二人团队”(the Nixon—Kissinger Dyad)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机制的核心。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当天连续签发了《第1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SDM1)和《第2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SDM2)这两份有关调整外交决策机制的文件。其中,NSDM1正式建立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和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以取代肯尼迪时期设立的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7]。NSDM2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事务中的地位大为提升,使其成为“向总统提供情报分析和政策倡议的首要机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这一头衔更名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出任这一职务的基辛格能够发挥“国家安全决策的重要作用”^[8]。

NSDM2出台后,不仅基辛格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规模和影响力空前扩张,已不再是协调各行政官僚机构意见的“信息交汇平台”,成为独立于国务院、国防部之外可自行制定外交政策的机构;而且基辛格本人作为尼克松的政策执行者,积极参与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的实际运作,推崇“秘密外交”,甚至控制了白宫向驻外使馆签发电报的权力,并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取消由副国务卿领衔,体现国务院外交政策议题审议权的高级部际小组,组建副部长委员会,主要处理不需要总统决策的非重要性议题;其次,组建包括高级审查小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第40委员会、越南特别研究小组等在内的多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机构,推行外交决策新机制。其中,由基辛格担任组长的高级审查小组充当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下属各委员会的联系纽带,并凸显出基辛格本人的重大权力——由他决定针对“何种议题”所提出的“何种建议”或“何种对策”在“何时”呈报总统。

在外交决策机制的具体运作上,通过发布《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基辛格可以直接指示国务院或其他情报机构起草关于特定议题的研究报告,待各机构政策建议完成后,基辛格主持召开由各机构官员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政策选择,并作出提交尼克松总统的政策建议。最后,尼克松总统在与基辛格磋商后,形成某项政策决定,并

由基辛格本人及其下属撰写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说明总统的决定,通过由国务院代表主持的副部长级委员会来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决定^[9]。因此,尼克松时代的安全委员会取代国务院成为美国外交与战略决策的核心机构,这一政治现象被形象地描述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领导着一个专家智囊团,实际上担负着一个“小国务院”的使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开始替代国务卿,成为总统的新闻发言人,并实际参与美国对外政策与危机管理的运作^[10]。

国家安全与外交事务政策建议与政策选择权限高度集中于基辛格一人之手,使得国务院、国防部及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在政策制定方面的权力大为削弱。特别是国务卿罗杰斯和国务院几近被排斥在重要对外决策活动之外。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在决策话语权、政策建议权及政策实施权的权力分配问题上呈现“实权”与“虚权”的结构性紧张,加之各个官僚机构的利益、认知理念、思维方式不尽相同,因此,针对某一重大战略或地区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本身就带有深切的官僚政治争斗与妥协的痕迹。可以说,“实权”(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虚权”(国务院)的纷争是尼克松时代“垄断寡头型”外交决策机制的基本特点。

二、基辛格在中美关系“解冻”进程中的作用分析

在尼克松的全球战略棋局中,推动中美关系“解冻”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环节。怎样才能在中美20多年冷战对峙的“坚冰”上开凿出双方传递改善关系的意愿和信息,并进行真切对话与信息沟通的渠道?由于长期的敌视与隔绝,美国不得不借助其他与中美均有较为密切关系的国家建立沟通渠道。其中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为核心的华沙渠道在中美两国探索改善关系的初级阶段曾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朗诺政变的发生,中断了中美通过华沙渠道的接触^[11]。为设法恢复与中国的联系沟通,尼克松—基辛格通过非常规的“秘密外交”决策机制启动多条秘密渠道^[12]。而尼克松和基辛格最为倚重并最终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是“巴基斯坦渠道”。“巴基斯坦渠道”的开启和有效运作,与其后1971年7月基辛格密访北京,乃至同一时期印巴冲突升级与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基辛格与黄震、黄华的多次秘密会晤均是中美关系“解冻”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而这一系列事件又十分清楚地展现了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机制的鲜明特征:由“二人团队”垄断性地掌控重大外交战略问题的决断权;热衷于“秘密外交”;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强制性地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

1969年8月1日,尼克松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随行美国媒体被告知美国政府将在当年年底出台对南亚军售的新政策^[13]。事实上,此次尼克松出访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领导人传递美国政府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在谈话中,尼克松向叶海亚·汗提出希望他充当中美沟通对话的桥梁,并由他向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传递美国的这一“友善”的信息。而且,尼克松也希望巴基斯坦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推动中美接近的进程^[14]。

尼克松与叶海亚·汗的此次会谈是严格保密的。8月19日,基辛格秘密致电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临时代办詹姆斯·斯宾,要求其按照尼克松总统指示,在驻巴大使馆的存档文件中销毁尼克松与叶海亚·汗的会谈记录,同时要求斯宾对国务院和罗杰斯严把口风,若国务院问及此事,则矢口否认^[15]。

8月28日,为确保“巴基斯坦渠道”的有效运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哈罗德·桑德斯会见了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阿迦·希拉里。针对8月1日叶海亚·汗在会谈中所提及的沟通方式与时机问题,桑德斯指出,美方希望叶海亚·汗总统能够在一种氛围轻松、自然的环境下向中国领导人直接传递来自美国方面的口信。同时,为保证美、巴、中之间信息互传的时效性与严格的保密性,桑德斯建议在希拉里与基辛格之间建立一个稳定的单向联系渠道^[16]。

从1969年8月到1970年底,“巴基斯坦渠道”成为中美之间传递信息的一条重要秘密通道,它的开启不仅充分显示了美国冷战战略思维由顽固的、“偏执狂式的”意识形态对抗向现实主义的复归,而且亦具有高度的隐秘性和严格的保密性^[17],从运作形式上看它是19世纪欧洲“秘密外交”的再现。从这一点来看,“巴基斯坦渠道”是当代“秘密外交”的成功范例。巴基斯坦之所以用一种隐秘的手法在中美之间传递信息,是为了满足华盛顿和北京这两个尚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的共同要求,尤其是白宫极力希望秘密外交在未取得积极成果之前,不被世人知晓。

从1971年初开始,“巴基斯坦渠道”的政治

效用得到不断强化。随着中美双方交换信息量的递增,“巴基斯坦渠道”所传递的关键信息不断增加,包括率先传递中方欢迎美方高层访华的信息、为双方的高层会谈进行周密安排等都在为推动中美“外交革命”帷幕的开启注入了持续动力。

1971年5月7日,基辛格与美国驻巴大使约瑟夫·法兰德在棕榈泉秘密会晤,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基辛格首先简要“回顾”了白宫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与中国开展秘密外交的相关情况,并说他自己将作为总统特使与中国代表在巴基斯坦或中国某地会晤。其后,两人就中美高层秘密会谈的时间、地点、会晤方式、搭乘的交通工具和行动路线的安排等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18]。在会谈结束之前,两人协定以美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海军武官德纳兹上校为秘密联络人,若有紧急事宜,二人可撇开国务院系统,通过德纳兹直接联系^[19]。

5月1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温斯顿·洛德在致基辛格的备忘录中指出,他已按时间顺序将“幸运饼干”档案^[20]中涉及与中国的秘密沟通信息进行整理,并认为“到目前为止,‘巴基斯坦渠道’是最有效的”。特别是在中国总理周恩来从叶海亚·汗总统那里听到有关信息后说,与他们以前从不同渠道得到的美国信息相比,巴方传递的信息是从国家元首通过国家元首传递给国家元首的,所以中方十分重视^[21]。

5月23日,法兰德致电基辛格,转达了叶海亚·汗就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想法。为掩人耳目,叶海亚·汗建议在基辛格逗留巴基斯坦期间,让总参谋长哈米德·汗上将陪同前往“参观”位于巴北部山区的总统行宫,并以身体不适为由秘密前往中国。而与此同时,法兰德则应该坐镇总统行宫以应付媒体^[22]。

6月28日,基辛格在与尼克松、法兰德秘密协商后,对他本人在巴基斯坦境内逗留的时间、秘密访问北京的时间、随行人员以及安全保障工作进行调整^[23]。

7月8日中午,基辛格抵达伊斯兰堡。当日傍晚,在巴方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基辛格“突然”感觉“胃痛”,然后被送往预先安排好的郊外总统别墅“治疗和休息”。由此,“现代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踪戏剧”正式上演。

基辛格一行经过7小时45分钟的飞行,于北京时间1971年7月9日中午12时15分抵达北京。稍事休息后,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在9日和

10日连续举行单次会谈时间长达7个小时的两次晤谈。双方就台湾问题、印度支那问题、日本问题、朝鲜问题、大国关系、军备控制与南亚问题广泛而深入地交换意见。在秘密外交各项要旨得到淋漓尽致展现的同时,中美高端战略对话在冷战冰封^[23]之后顺利进行。

在“巴基斯坦渠道”圆满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的同时,中美秘密外交浮出水面,转变为震惊世界的“冲击外交”^[24]。1971年7月15日,中美同时公布了《中美七—五联合公报》,透露了基辛格已经访问北京的消息,尼克松总统也宣布他将于1972年春访问北京。此消息一出,即刻震惊世界。由“二人团队”总策划的这一“冲击外交”给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说它是“冲击外交”,是因为它是美国推动冷战战略转型过程中获得的重大外交成果,并为创造性地实现政治目的而采取了非常规手段。无论西方国家抑或东方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均会受到相当大的有形或无形的波及影响。不容置否的是,“冲击外交”所产生的震荡性政治效应不仅会影响大国的对外战略、世界政治板块的分化组合,更会对与“冲击外交”本身具有政治粘连关系的国别政治、区域政治产生难以料及的联动影响,其中之一便是作为中美关系“解冻”“关键国家”的巴基斯坦。

在“巴基斯坦渠道”紧锣密鼓运作的同时,巴基斯坦国内纷争不断,叶海亚·汗军人政权与东巴孟加拉激进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将国家推向内战与分裂的深渊。相较风雨飘摇的巴基斯坦,美国正积极开掘“解冻”中美关系的外交渠道,试图扭转相对于苏联的战略颓势。而尼克松和基辛格最为倚重并最终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是“巴基斯坦渠道”。如何在推进“巴基斯坦渠道”有效运作的同时,适时关注并切实应对东巴危机是尼克松政府必须审慎思量的重要问题。

在美国的战略图谱中,南亚并非战略要地。若仅是就事论事地从解决次大陆政治纷争的角度应对南亚危局,“二人团队”在应对危机、处理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时就不会在西巴军事清洗问题、难民问题、对巴军售问题、东巴政治和解问题上采取偏向巴基斯坦的政策。但是,若从美国全球战略布局来看,南亚乃至巴基斯坦都具有相对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表现为处于内忧(东巴内战)外患(印巴危机)的巴基斯坦同时与中美保持友好关系。在基辛格秘密外交公开之后,苏印出

于各自利益,缔结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苏联在南亚危机中的介入程度大为增强,并随着危机逐渐滑向战争,成为中美两国反制、防范、谴责的首要目标。在对待危机的立场态度上,中美两国均反对印度在苏联的幕后支持下借东巴内乱实行扩张,削弱巴基斯坦。因此,1971年南亚危机前后的华盛顿、北京、伊斯兰堡之间呈现三组双边关系的正向联动效应。不仅中美关系的“解冻”使得美巴、中巴关系呈现互为促进的正相关性,而且中美接近的战略考虑在尼克松政府对巴政策中也有充分反映。这也正是尼克松政府会在南亚危机中采取“偏袒”巴基斯坦政策的原因所在。由于南亚一直都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主战场,并且中巴关系密切,而中印关系却积怨较深,美国在处理南亚危机时必须小心谨慎,密切关注中国的动向,唯恐因南亚危机处理不周而使中美和解进程出现意外变故。随着印巴冲突的不断升级,美国考虑到上述诸多问题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因此不断加强与中国的政策协调。

1971年8月16日和9月13日,基辛格在巴黎与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黄震就南亚危机进行两次秘密会谈。基辛格针对中美之间的秘密交流曾指出,在南亚危机日趋紧张之际,“我们认为中美之间保持交流以及对印巴施与一定的影响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25]。

11月22日,印巴双方在东巴的杰索尔地区猛烈交火,东线冲突拉开帷幕。次日,基辛格在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以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的陪同下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秘密会晤。此次秘密会谈的中心议题是印巴紧张局势。基辛格指出“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一个国家有权使用武力去强制解决任何因难民问题而引起的紧张状态,我们也坚决反对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侵犯。”因此,美国政府将继续坚持他本人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所表明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侵略的立场。基辛格向黄华表示,若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次大陆战争问题,美国政府希望与中国沟通协调,反对印度的侵略行径和苏联的幕后操纵^[26]。

12月3日,第三次印巴战争正式爆发之后,中美继续就印巴紧张局势进行秘密协调。12月10日和12日,基辛格两次与黄华秘密会晤,商讨印巴局势。基辛格告诉黄华“如果南亚局势发展威胁到你们的安全,而你们将为维护自己的安全采取果断行动的话,尼克松总统表示美国政府

坚决反对其他国家武力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27]

12月12日上午,尼克松、基辛格和黑格在白宫举行小范围会谈,会谈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将会采取何种举措和行动。按照基辛格的描述,他们三人是“在笼罩一切危机的孤独状态中、在相互矛盾的压力和猜测和逐渐增长的紧张气氛中,在椭圆形会议室碰头的”^[28]。经过紧张讨论,三人一致认为“若中苏之间兵戎相见,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一些战略轰炸机,但要避免核战爆发”^[29]。

需要指出的是,尼克松政府的南亚危机政策的形成、整合与具体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以“二人团队”为核心的白宫“全球主义者”与以国务院为代表的“地区专家”针对南亚危机采取的审视角、政策方针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分歧。“偏袒”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在白宫与国务院纷争难平的僵持情况下,依靠“二人团队”行政压力才得以制定与强制贯彻。“二人团队”的政策理念难获各决策机构的支持,在政策的执行上,国务院对白宫的决定往往消极对待,甚至唱对台戏。这种决策机制上的结构性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南亚危机政策上的混乱^[30]。通观美国的危机决策,“二人团队”为“确保其战略观念的连贯性而依赖严密的中央控制——通过将官僚机构差不多完全与决策过程切断换来的控制。这意味着地区性知识——为避免全球视角应用于解决当地问题所固有的扭曲而必需的那类专业知识——过于经常地被忽视”^[31]。

三、结语

中美关系“解冻”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一事关美国全球战略总体布局的重大事件充分展现了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机制的鲜明特征,并凸显出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权力谱系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卓著地位。首先,伴随着外交决策机制的调整,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地位大为提升。在改组之后的外交决策机制中,基辛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愈发成为控制和约束国务

院、国防部等官僚机构的“外交决策中枢”。基辛格不仅成为尼克松总统的首席外交决策顾问,而且也是以总统名义进行谈判的首席谈判者和政策发言人。“人人对基辛格负责,基辛格对尼克松总统负责”是以“二人团队”为中心的“垄断寡头型”外交决策机制的核心要旨。依照1947年《国家安全法》和1949年《国家安全法(修正案)》的规定,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不具有国务卿那样的内阁官员头衔,总统对国家安全顾问的任命也不需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但从总统的角度来看,“总统可以不受约束地指派国家安全顾问充当自己的个人使节,担负特殊、敏感的重要外交使命,国家安全顾问也可以不受行政职责和官僚机构的束缚,随时听候调遣,其行动也不会那么引人注目”^[32]。以尼克松—基辛格“二人团队”为例,总统权威和国家安全顾问决策倡议权的增长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基辛格的纵横捭阖加强了尼克松对外交权力的掌控,提高了总统自身战略意图转化为外交决策的效率。另一方面,尼克松对基辛格的授权与信任,使得基辛格的地位得以不断攀升,日趋显赫。相比之下,罗杰斯领衔的国务院的地位和作用则大为下降,退化为外交政策的“被动执行者”。其次,个人色彩浓厚、目的明确的秘密外交被广泛运用。略去官僚机构之间的相互盘算和反复纠缠,在不受国会监督的情况下,以最隐蔽、最少外界干扰、最具效率的方式推进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二人团队”施用秘密外交的基本考虑。依前文分析可见,中美关系“解冻”,尤其是“巴基斯坦渠道”的开掘和运作是当代秘密外交成功的经典范例,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极为深远。但另一方面,“单骑突进式”的秘密外交在无形之中加剧了尼克松时代外交决策机制上“实权”与“虚权”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决策过程中的潜在危机,违背了美国立国以来政府决策的民主程序理念,毕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便基辛格获取“当代的俾斯麦”之美誉,但在风云际会、繁复多变的国际事务面前,也难免会力不从心。

[参 考 文 献]

- [1][2]Richard M. Nixon,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A New Strategy for Peace,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p.2; p.62.
- [3]相关研究可参见 Seyom Brown, The Crisis of Power: An Interpretation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Kissinger Year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Nix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William Bundy, A Tangled Web: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Presidenc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8; 巨永明《核时代的现实主义:基辛格外交思想研

- 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龚洪烈《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4] Jerel A. Rosati. Developing a Systematic Decision - Making Framework: Bureaucratic Politics in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3, No. 2(1981), pp. 246 - 247.
- [5] 夏亚峰《试析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机制、过程及主要人员》,《史学集刊》,2009年第4期。
- [6] Rubin Barry, *Secrets of State: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Struggle over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43.
- [7] [8]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 FRUS) 1969 ~ 1976, Vol. II: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U. S. Foreign Policy, 1969 - 1972,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5, pp. 29 - 30; p. 31.
- [9] 有关尼克松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决策运作流程的提炼分析可参见 Jean A. Garrison, *Games Advisors Play: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and Carter Administrations*, New York: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0] 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 [11] 王成至《跨越雷区的握手:1969 - 1972年中美缓和进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3页。
- [12] 有关中美在1969 - 1972年间秘密接触、探索交流沟通渠道的研究可参见杨贤《特殊机构——美国驻华联络处揭密》第一章,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5 - 41页。
- [13] Dennis Kux,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1947 - 2000: Disenchanted Allies*,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1, p. 181.
- [1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Lahore, August 1, 1969, 2: 30P. M. - 3: 30P. M." FRUS, 1969 - 1976, E - 7: Documents on South Asia Crisis, 1969 - 1972,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47719.pdf>.
- [15] [16] [19] [21] [22] [23] [25] F. S. Aijazuddin, ed. *White House & Pakistan: Secret Declassified Documents, 1969 - 197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63 - 64; p. 67; P. 143; pp. 140 - 141; p. 145; pp. 149 - 151; pp. 285 - 286.
- [17] 已有研究认为,“巴基斯坦渠道”是一个高度保密的渠道。巴基斯坦方面仅有叶海亚·汗总统、外交国务秘书苏尔坦·汗、驻美大使希拉里以及叶海亚·汗的军事秘书艾哈迈德·阿兹(Ahmed Aziz) 4人参与其中。美国一方也仅限于尼克松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及其副手黑格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少数几位高级官员。
- [18] "Kissinger to Nixon, 'Meeting with Ambassador Farland, May 7, 1971' 15 May 197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66: The Beijing - Washington Back - Channel and Henry Kissinger's Secret Trip to China, September 1970 - July 1971, available at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66/ch-22.pdf>.
- [20] “幸运饼干”档案(The Fortune Cookies Book)是由基辛格设立的涉及中美秘密外交的档案卷宗。该卷宗由基辛格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特别管理,卷宗情况高度保密。
- [24] 日本学者岩岛久夫曾将基辛格秘密访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形象地称为当代外交中“突然袭击外交”或“冲击外交”的经典范例。参见[日]岩岛久夫著,张健、贺小铭译《突然袭击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102页。
- [26] [27] FRUS 1969 - 1976, Vol. XVII: China 1969 - 1972, pp. 596 - 597; p. 609.
- [28]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三)杨静予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1158页。
- [29] FRUS 1969 - 1976, Vol. XI: South Asia Crisis 1971, p. 785.
- [30] 有关1971年南亚危机期间对美国危机决策的分析研究可参见张威《战略抉择与危机应对——基于尼克松政府应对1971年南亚危机的研究》,《国际论坛》,2012年第3期。
- [31] [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第348页。
- [32] 周琪《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

The Status and Role of Kissinger in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America Rapproche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U. S. Declassified Archives

ZHANG Wei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438000, China)

Key Words: Sino-U. S. relations; U. S.; Kissinger; Foreign Policy Making

Abstract: Kissing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schola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master strategist in the Cold War era, and then he is also one of the core members of the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n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President Nixon and Kissinger monopoly control the U. S. 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case of Sino-America Rapprochement, Kissinger continuously controlled the U. 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then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of big powers, with the adjustment of the American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the Nixon era.

[责任编辑:魏善玲]